

延大89級收稿系

史學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

—

唐 攸主编

真誠

嘉良

公寸

三部曲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

—
唐 弢 主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责任编辑：毛承志

封面设计：古 干

中国现代文学史(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81,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1}{2}$ 插页2

197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 215,001—237,500

ISBN 7-02-000079-7/I·80 定价 1.45 元

前 言

本书系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教材，约六十余万字。拟分成上下册，上册并分为第一分册和第二分册，陆续出版。

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开始编写本书，至一九七九年上册第一分册付印，中间情况变易，停顿多年，编写工作和参加人员，都有变动。前后大致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一九六一年初夏开始集中人力，组成编委会，到一九六四年夏完成全书讨论稿，近六十万字，历时三年。参加编写的同志有：文学研究所唐弢、路坎、樊骏、吴子敏、徐迺翔、许志英，北京大学王瑶、严家炎，武汉大学刘绶松，北京师范大学李文保、杨占升、蔡清富、张恩和、吕启祥，陈子艾，山东大学刘泮溪，厦门大学万平近，华中师范学院黄曼君。由王瑶、刘绶松、刘泮溪、严家炎、李文保、万平近、路坎、唐弢组成编委会，并由责任编委严家炎、刘绶松、王瑶、刘泮溪、路坎分段负责，然后由主编唐弢最后改定。当时协助主编修改上册初稿的为：严家炎、樊骏、路坎。在这一阶段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负责人之一陈灿，为本书的

编写作了大量组织工作，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在解决图书资料方面，同校王德宽也作出积极的努力与贡献。

第二阶段：自一九七八年九月起，重新恢复和建立了编写组。主编唐弢因健康关系，不能负责全面工作，委托责任编辑严家炎代行，着手本书上册的修订和下册的编写。上册修订工作除由严家炎全面负责外，樊骏协助修改了“左联”部分，蔡清富、吴子敏协助修改了某些章节。下册初稿二十五万字于文化大革命中丢失，需重新编写。十五年来，原有成员变化很大：路坎、刘绶松、刘泮溪先后逝世；王瑶等或忙于其它业务，或工作已有调动，未能继续参加，编写组不得不作适当的调整和扩大。除原来的唐弢、严家炎、樊骏、吴子敏、徐乃翔、蔡清富、张恩和、黄曼君、万平近等九人外，甘肃师范大学陈涌，北京师范学院鲍霁、易新鼎，北京大学黄修己等参加了本书下册的编写工作。其中陈涌为责任编辑之一，负责和顾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解放区文学的编写。

本书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史料，由北京大学段宝林起草和提供。目前第二阶段的工作，正在继续进行中。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	28
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28
第二节 文学革命的内容及历史意义	43
第三节 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	56
第四节 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70
第五节 对复古派的斗争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	81
第二章 鲁迅(上)	95
第一节 生平 and 思想发展	95
第二节 《呐喊》、《彷徨》	112
第三节 《阿Q正传》	130
第四节 杂感和散文	139
第三章 郭沫若	157
第一节 思想发展与文学活动	157
第二节 《女神》	169
第三节 《前茅》、《恢复》等诗集	181
第四节 早期剧作和小说	188
第四章 “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的文学创作 (一)	194

第一节	文学革命初期的创作·····	194
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	205
第三节	叶绍钧的作品·····	218
第五章	“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的文学创作 (二)·····	227
第一节	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	227
第二节	语丝等社团流派和闻一多等人的创作·····	237
第三节	话剧运动与剧本创作·····	255

翻译文学 应作为研究的对象
翻译为文献
文学不在于翻译，而在于创造
重要：作家作品。《作品与年谱》

绪 论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

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这样。适应着新的时代需要，它吸取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化和文学方面的许多成分，同时也利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思想资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去完成先驱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有必要先对

深刻头脑

恩格斯曾多次表示过这类意见。可参阅《反杜林论·引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处引文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第4卷第485页。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状况作一番考察。

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由衰微而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一八四〇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买办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①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②，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近代文学在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93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

新的现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喑”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①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康有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正统文化；而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②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与这个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作为优秀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

① 见洪仁玕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

② 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变法起源记》。实际还不止此数。

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①的理想；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多少做到了如《杂感》诗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陈荣衮）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之言”^②等主张。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在诗文以外的文学样式方面，引起了尤其显著的变化。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統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祐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

① 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

② 裘廷梁、陈荣衮分别写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报章宜用浅说》（1899）等文。

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纾的译作曾在当时有过较大的影响。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它们在进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在这个时期以“新剧”或“文明新戏”之名开始传入。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间，春柳社等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进化团稍后又在长江下游各地演出宣传革命的幕表戏多种；这些活动既从思想战线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为我国戏剧输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近代进步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以至文学形式（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看重小说、输入话剧）方面，都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

唯其是“一个过渡”，近代进步文学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如同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

政治斗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未能尽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对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仅政治上维护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触动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学说。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快便趋于反动；而在不少新派作品里，封建思想也仍然占有地位。提倡白话的呼声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但他们大多数是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须维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张，也因为时代条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和造成较大的声势。翻译西方文学的工作当时也处于盲目被动、缺乏系统的状态；林纾虽然译述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带着改作的成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也因为没有与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彻底，始终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口号。革命派本身的脱离群众，一些代表人物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去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的运动，致使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甚至还不如维新派。至于对帝国主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它们，对它们颇多幻想。此外，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弱点是：虽然在暴露上层腐败生活方面能够淋漓尽致，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却极端缺乏了解。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曾经起

过进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学，也终于受到被称为“十里洋场”的近代都市中恶浊气氛的腐蚀而趋于堕落：“谴责小说”沦为“黑幕小说”，甚至成了专门诋毁私敌的“谤书”；民国初年出现的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则由最初具有些微进步倾向（感叹世态炎凉、不满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渐演变为满纸陈词滥调、远离现实生活并有浓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文明新戏也褪尽了原来的战斗色彩，充满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

近代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深刻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近代文化的这一著名论断：“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①

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虽然已为新文学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乃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

二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7页。

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

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

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

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①，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

更多更坚实的发展。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

文学上的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政策来实现的，它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力的新文学，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它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担负着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崇高使命。“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使文学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谬种、玄学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里人民革命的战斗要求；而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创作，则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精神的“遵命文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的日益发展和深入，文学为革命服务也更其鲜明